鯨說島嶼：19 世紀前臺灣鯨豚傳說與記載*

許玉欣**

摘要

臺灣四面環海而立，海洋環境多元豐沛，尤其周邊海域具豐富的鯨豚生態，而鯨豚則作為海洋食物鏈的上層、生態環境的指標。百年前的大海、岸邊，與人類相遇接觸譜出的傳說與故事，代表著臺灣作為海島的存在，以及與海洋間密切的關係。

在文字尚未出現前，化石作為過去存在的證明，日治時期已有不少在臺挖掘鯨豚化石的例證，從實體的骨骸中檢視千年前臺灣的海島生態；自 18、19 世紀開始，移民社會下的海島臺灣，透過地方遊記、地方志資料中，陸續出現描寫鯨豚的生物特徵，抑或誇大描寫這一個奇特且龐大神秘動物的故事。與此同時，西方博物學體系透過不同的視角進入，史溫侯觀察與分析在臺擱淺的鯨豚品種，甚至將骨骸寄往英國鑑定、命名，歷史記載中，曾因未知原因擱淺海岸的鯨豚骨骸，為臺灣鯨豚留下了紀錄。

除歷史記載以外，透過傳說更是生動展現鯨豚的角色。漢人有關於鄭成功騎乘大鯨以及大鯨化身的傳說故事，神秘且龐大的鯨豚，與熟悉海洋的海盜身分相連；同時，來自海洋的原住民族，尤其反映在阿美族與卑南族中，擁有活靈活現般地鯨豚傳說，鯨豚的存在，隱性化約在現今的海祭儀式淵源。

漫漫歷史大海之中，孕育無數海洋生命，轉瞬而間，留下許多海洋故事，透過爬梳鯨豚的歷史記載與傳說故事，以不同視角重新檢視海洋史，追尋海島的痕跡，以及海洋史中擁有生命力的牠們。

關鍵詞：鯨豚、化石、鯨豚傳說、海祭、海洋史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

* 本文改寫自筆者碩士學位論文〈傳說、利用與保育：近代臺灣海洋史中的鯨豚〉，承蒙本刊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建議，特此致謝。

**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

壹、前言
貳、鯨豚化石與擱淺記載
參、漢人與原住民族鯨豚傳說與想像
肆、結論：豐富的生態與海洋想像空間

壹、前言

臺灣作為一個四面環海的島嶼，周邊不乏有豐富的海洋資源與生態，在悠悠歷史長路上，海洋作為一個載體，不只承載著人類的文明與記憶，同時也存在著許多非人動物的身影，海洋生物所代表的不僅只是被食用、商業又或是貿易的意涵，實則也作為海洋文化史的一環，牠們成為了歷史的一部分，而無盡的大海裡有許多等待被挖掘的故事。

在大海中，作為上層食物鏈的鯨豚，被視為擁有高智慧，亦往往被作為海洋生態的指標。在全世界鯨豚種類大約 80 幾種，根據學者的研究，在臺灣附近海域就有超過 30 幾種，[1]位於如此重要地域的臺灣，也揭示著尚待爬梳的，豐富的臺灣鯨豚故事。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與臺灣相距不遠的日本，鯨豚所形構出的文化與歷史，則部分被視作為日本文化背景的一環，其中亦包含捕鯨議題。2018 年 12 月 26 日，日本宣布退出國際捕鯨委員會（IWC），認為鯨豚不屬於瀕臨絕種的物種，並強調捕鯨與「鯨食」作為日本傳統文化的重要性，因此決定恢復商業捕鯨。[2]不管是商業還是文化的考量，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文化與鯨豚之間的關係，顯性的留存於現今日本部分地區流傳的鯨食、鯨供養、鯨墓、鯨祭典，以及各式各樣以鯨豚或捕鯨作為主軸所表現的歌曲、舞蹈技藝。[3]

同樣作為海島的臺灣來說，與鯨豚所建構而出的歷史與海洋文化，似乎未如日本一般顯眼，但並非不存在。本文欲透過 19 世紀前臺灣漢

---

[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108 年度臺灣周邊鯨豚族群調查計畫成果報告書」（2019 年 12 月 19 日），頁 1。

[2] 〈中斷 30 年 日本明年七月重啟商業捕鯨 宣布退出國際捕鯨委員會 未來恐面臨反捕鯨國反彈，外務省憂傷害國際形象〉，《聯合報》，2018 年 12 月 27 日，A10 版；〈退出國際捕鯨委員會日本重啟商業捕鯨〉，《聯合報》，2018 年 12 月 27 日，聯合晚報 A5 版。

[3] 中園成生，《日本捕鯨史【概說】》（福岡：古小烏舍，2020 年二版），頁 143-155。

人、原住民鯨豚傳說及記載，在多元族群的臺灣島上，鯨豚在不同族群、不同時期，呈現多元面貌，透過鯨豚身影來訴說臺灣海島故事。首先就千年前深埋地底的鯨豚化石，印證曾活躍的海島生態；進入到明清時期，地方志、遊記，以及在臺外國人史溫侯留下的記載，鯨豚被書寫，描繪生物特徵，甚至飽含誇示性的形容與想像，以此說明人們對海洋生物鯨豚認識與轉變；記載之外，傳說故事從漢人、原住民的脈絡中可見，人們如何看待鯨豚，也關乎著對於海洋的認識與瞭解。透過鯨豚在臺的傳說與記載，不管是化石、文字、口傳故事，在在展示臺灣海島的活力。

過去鯨豚相關研究中，已有不少透過地方志針對清代鯨豚進行書寫與整理者，如陳國棟〈上達天聽——乾隆八年苗栗通霄的鯨魚大擱淺事件〉，主要以乾隆 8 年發生的大量鯨魚擱淺事件為主軸，描述此事經由地方官員上達天聽的過程。[4]陳德勤之〈清代臺灣鯨目動物史料初探〉，梳理清代臺灣的方志、文獻當中與鯨豚類有關的記載，[5]以及李宜靜〈清代臺灣文獻中的鯨魚傳說〉，也是以清代臺灣文獻為主，分析鯨豚史料，以清代文獻中所出現的「鯨魚」或者「海翁」等資料，來看當時鯨魚擱淺現象如何被想像，並列舉了鄭成功與鯨魚之間的傳說故事。[6]而檢視清代鯨豚的記載，不無敘述鄭成功傳說者，鄭成功被視為大鯨化身，又或者是騎乘大鯨般海上梟雄的形象、一種海中霸王的象徵。但與鄭成功不同的鯨豚故事，同時也出現在原住民族的傳說當中。

早已居住於島嶼上的原住民族，留下了與鯨豚相關的傳說，甚至有部分傳說隱性的化為現今原住民族海洋文化脈絡的一環。目前在原住民鯨豚傳說部分，主要針對文學面向作研究，如蔡惠琴〈從鯨魚到飛魚——原住民的魚類神話傳說與飲食文化〉、鄧郁生〈日治時期阿美族女人島傳說的異域論述〉與范玉廷〈臺灣原住民族口頭傳說之島嶼試探——兼論 sanasai 的真實與想像問題〉，皆談及原住民族的鯨豚傳說，並試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

[4] 陳國棟，〈上達天聽——乾隆八年苗栗通霄的鯨魚大擱淺事件〉，《臺灣文獻》（別冊），32（2010 年 3 月），頁 2-13。本文後續收錄於陳國棟，《記憶、海洋與尋常歷史》（新北市：淡江大學出版中心，2020），頁 189-197。

[5] 陳德勤，〈清代臺灣鯨目動物史料初探〉，《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15（2010 年 12 月），頁 38-45。

[6] 李宜靜，〈清代臺灣文獻中的鯨魚傳說〉，《康寧學報》，14（2012 年 6 月），頁 67-80。

圖以文學面貌來分析原住民的海洋想像。[7]此外，周育聖〈臺灣神話傳說與故事中的海洋文化研究〉，則是包含漢人、原住民的傳說，進行對於海洋生物、海洋信仰和海洋人物的分析，並對臺灣的海洋文化做整體分析、描寫。[8]雖有文學相關的研究成果，但仍較少以鯨豚傳說故事為主軸者。

與鯨豚相關的研究，多半著重在方志中的鯨豚擱淺記載，又或者文學傳說中，將鯨豚故事作為例子舉證。尤其在談論海洋史中，海洋生物很常被化約為貿易一環裡的「數字」，難以展現牠們躍出海洋的姿態。李鑑慧〈由邊緣邁向中央：淺談動物史學之發展與挑戰〉所述「……另一方面，若考量動物主題於眾多史學領域中之滲透（如思想史、政治史、藝術史、宗教史、科技史、醫學史等），與其將『動物史』視為一不斷成長的獨立領域，亦可將之視為各史學領域中所增闢之主題與觀點。」[9]因此，本文試圖透過鯨豚在臺灣島嶼上的化石、文字史料記載以及傳說故事，將鯨豚生物作為主角之一來書寫，希冀展現臺灣海洋史的不同面貌。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7] 蔡惠琴，〈從鯨魚到飛魚——原住民的魚類神話傳說與飲食文化〉，《中華飲食文化基金會會訊》，13：4（2007 年 11 月），頁 23-29；鄧郁生，〈日治時期阿美族女人島傳說的異域論述〉，《臺灣文學研究學報》，15 期（2012 年 1 月），頁 117-150；范玉廷，〈臺灣原住民族口頭傳說之島嶼試探——兼論 sanasai 的真實與想像問題〉，《有鳳初鳴年刊》，13 期（2017 年 5 月），頁 194-217。

[8] 周育聖，〈臺灣神話傳說與故事中的海洋文化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與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9] 本段引用自：李鑑慧，〈由邊緣邁向中央：淺談動物史學之發展與挑戰〉，《成大歷史學報》，58（2020 年 6 月），頁 256-257。

貳、 鯨豚化石與擱淺記載

一、化石畫史：臺灣海峽周圍的鯨豚生態

在文字記載以前，化石作為生物存在歷史的證明方式之一，將對牠們的認識，推展到沒有文字的時代，同時，化石這一實體透露重要資訊：臺灣海峽周圍的鯨豚生態史。

在近代臺灣，其實有不少的鯨目化石被挖掘出來。1937 年，丹桂之助在《臺灣地學記事》內發表了一篇臺灣產化石的雜記，內文便以臺灣出現的海豚科化石為主，提到有兩地出土了海豚化石，分別是牧山鶴彥技師在新竹州竹南郡後龍庄所採集；另一則是國分廉二在臺南州新化郡左鎮庄所發現。丹桂之助認為鯨類雖然在第三紀（Tertiary）[10]以後的地層並不算罕見，但這是他在臺灣第一次產出海豚科化石的報告。[11]也因此，在日治時期就已有總督府技師、其他採集者等探查臺灣地質並進行化石採集工作，尤其在這之中也發現海豚科的化石。

戰後在苗栗錦水、臺南六甲，以及澎湖海溝等地也都有發現鯨目化石在臺灣的蹤跡。[12]其中在 1960 年代，由於中國石油公司在新竹地區探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

[10] 第三紀（Tertiary）此一名稱在 18 世紀出現，不過在 1989 年正式刪除此一名詞於國際年代地層表中，雖然第三紀的存廢一直存在爭議，但目前第三紀已拆成古近紀（Paleogene）、新近紀（Neogene）。參考：蘇品如，〈地質時代第三紀存廢爭議〉，《地質》，35：3（2016 年 9 月），頁 75-79。

[11] 本文中提到的「國分廉二」，在丹桂之助的原文內記載為「國府廉二」，但並未找到此人，可能為丹桂之助的誤植。由於化石出土於臺南左鎮庄，此人可能指當時正在臺南新化農業專修學校任教的「國分廉二」。另一篇早坂一郎於 1932 年所寫〈臺南州新化地方の化石哺乳類（犀の齒の產出）〉就有提及這位住在新化的國分廉二氏贈與其化石的消息。參考：丹桂之助，〈新竹州竹南郡及臺南州新化郡產イルカ科脊椎骨化石（臺灣產化石雜記 VII）〉，《臺灣地學記事》，8：7（1937 年 9 月），頁 92-95；早坂一郎，〈臺南州新化地方の化石哺乳類（犀の齒の產出）〉，《臺灣地學記事》，3：10（1932 年 11 月），頁 108-109；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昭和十二年七月一日現在）》（臺北：臺灣時報發行所，1937），頁 605；陳光祖，〈試論臺灣各時代的哺乳動物群及其相關問題——臺灣地區動物考古學研究的基礎資料之一（下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1：2（2000 年 6 月），頁 410-411。

[12] 有關於臺灣鯨目化石相關出土，詳細可再參：林朝棨，〈臺灣化石脊椎動物目錄〉，收入陳兼善，《臺灣脊椎動物誌（上）》（臺北：臺灣商務，1993），

勘油礦，無意間發現了一鯨目化石，這一鯨目化石被加以研究分析，在 1965 年經由黃敦友描述、並於後發表，此化石實為一產自新竹竹東鎮上大湖附近上新世（Pliocene）卓蘭層（Cholan Formation）底部的新種，這隻古鯨被命名為「臺灣鯨（Balaenoptera taiwanica）」，屬於臺灣特有種，可能生活在 200 多萬年以前。[13]此後 20 世紀末，陸陸續續有鯨豚化石被發現，而這些珍貴化石的存在，從實物的角度顯示著海島臺灣過去的生態環境，也展現了島上的海洋生命力。

化石的年代已然距今幾萬、幾百萬年前，除了透過化石分析之外，難以獲取雙方互動的確切資訊，但確實透露出臺灣島嶼上千年的鯨豚蹤跡，以及曾經存在的海洋生態環境。

二、刻劃鯨豚：文獻上的鯨豚擱淺記載

隨著擱淺與海上的接觸，人們對於鯨豚有更多的認識。18 世紀以後，陸續在地方志、遊記等文獻史料上出現鯨豚的記載。透過人的觀察、描寫，具體地呈現於如何稱呼鯨豚的名稱、描寫生物特徵或者是人們的反應，從而進一步顯現對鯨豚與海洋的認識。本節根據目前所搜集的清代臺灣地方志、相關遊記為資料，而在當時並沒有明確的生物學分類，也因此筆者以文獻中出現的名稱、描述和分類為主，將之分成海翁、海豎（蜈魚）以及其他，參考表 1。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XIV；魏國彥，〈臺灣第四紀哺乳動物化石研究的回顧與前瞻〉，《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特刊》，18（2007年9月），頁261-286；蔡政修、R. Ewan Fordyce、張鈞翔、林良恭，〈臺灣鯨豚化石研究回顧與現況〉，《臺灣生物多樣性研究》，15：2（2013年4月），頁115-117。

[13] 關於黃敦友的這篇臺灣鯨的文章，投稿於 1965 年，正式發表於 1966 年 4 月。此外除了「臺灣鯨」之外，1998 年在苗栗苑裡也出土了一隻鯨目化石，這隻古鯨被判定為新種，命名為「苑裡偽虎鯨（“*Pseudorca yuanliensis*”）」，不過根據蔡政修等人所述（2013 年），這一學名尚未有正式學名的資格，屬於非正式的學名。參考 Tunyow Huang (黃敦友), “A New Species of a Whale Tympanic Bone from Taiwan, China, ”*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Paleontological Society of Japan, New Series* 1966, no. 61 (1966): 183-87；蔡政修、R. Ewan Fordyce、張鈞翔、林良恭，〈臺灣鯨豚化石研究回顧與現況〉，頁 115-117；楊冬青，〈完整古鯨化石 鑑出新種，苗栗挖出命名「苑裡偽虎鯨」研判百萬年前擱淺死亡〉，《聯合報》，1998 年 4 月 4 日，第 19 版。

表1：清代文獻中的鯨豚名稱

種類	文獻上的名稱	性質說明
海翁	鯨、海翁、海翁魚、海鰍、鰌、海鰌、巨魚、鯤、鯨鮌	體型巨大，會噴水、胎生、皮生砂石，有時會擱淺於沙灘，人們會割取其脂肪使用。
海豎（蜈魚）	蜈魚、海豎、海豎	形狀如海翁，不過卻與海翁區分，強調其頭部長的像豬，會躍出水面，並會噴水。
其他	海鼠、海狗、海和尚、海馬[14]	皆可能為海洋哺乳動物，但尚未能確定其性質。

說　　明：清代中國各地也有對鯨豚的各種稱呼存在，如以魚昔、房魚來稱呼鯨魚；海豨來稱呼海豚等。而上述名稱並未出現在本文所搜集的臺灣相關文獻中，也因此對於鯨豚的稱呼存在著地區、時間上的差異，本文主要處理以臺灣為主軸的史料來進行分析。[15]

資料來源：本表格主要參考清代地方志等相關文獻資料整理而成，詳見註腳。[16]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14] 關於海鼠、海狗、海和尚、海馬四種，很可能也屬於海洋哺乳動物，只是目前資料過於稀少，且文獻中沒有更具體的生物特徵描寫，因此較難以界定其種類。根據文獻之說明：海鼠（頭有孔，重者四、五百斤）、海狗（頭似狗而魚身，尾尖，四翅）、海馬（狀如馬，頸有鬣，亦四翅）、海和尚（色赤，頭與身皆人形，四翅無鱗）。其中海鼠具有「頭有孔」的特徵，可能是具備「噴氣孔（blowhole）」的鯨豚類特徵，極有可能是體型較小的鯨豚種類。參考：〔清〕陳培桂，《淡水廳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1871年成書），頁332-334；陳光祖，〈試論臺灣各時代的哺乳動物群及其相關問題——臺灣地區動物考古學研究的基礎資料之一（下篇）〉，頁412-415。

[15] 沙大禹，〈清代地方志中的鯨魚資源研究〉，頁17-18。

[16] 〔清〕胡建偉，《澎湖紀略》（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1，1771 年成書），頁 182；〔清〕朱仕玠，《小琉球漫誌》（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57，1765 年成書），頁 63、65；〔清〕陳文達，《鳳山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1720 年成書），頁 116；〔清〕蔣毓英，《臺灣府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7，1685 年成書），頁 85；〔清〕屠繼善，《恒春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1894 年成書），頁 179、191；〔清〕唐贊袞，《臺陽見聞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1892 年成書），頁 137、174-175；〔清〕蔣師轍，《臺游日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1892 年成書），頁 74；〔清〕陳淑均，《噶瑪蘭廳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1852 年成書），頁 309；〔清〕周鍾瑄，《諸羅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1717 年成書），

另參考李宜靜，〈清代臺灣文獻中的鯨魚傳說〉，頁67-80；沙大禹，〈清代地方志中的鯨魚資源研究〉，山東：中國海洋大學歷史地理學碩士論文，2012；陳德勤，〈清代臺灣鯨目動物史料初探〉，頁38-39；陳光祖，〈試論臺灣各時代的哺乳動物群及其相關問題——臺灣地區動物考古學研究的基礎資料之一（下篇）〉，頁412-415。

根據上述分類，除了難以辨識為何種海洋哺乳動物的類別以外，可以確定的是鯨豚的名稱主要被區分為兩種類別。以下分別根據「海翁」與「海豎」在文獻中所出現的記載，來梳理清代臺灣人們對鯨豚的認識。

首先以被稱呼為「海翁」者來看，也是如今所知的「鯨魚（whale）」，這一類的存在往往是巨大、龐然的形象。根據臺灣各地的方志，如《諸羅縣志》「海翁：即海鰌，大能吞舟，浮於水面，黑如牛背。俗謂海翁，現則大風將作。」、「海翁魚，大者如山……」[17]另外《小琉球漫志》「海翁魚，即海鰍也，大者重至五、六萬斤。」、「海翁魚，即海鰍也，皆屬胎生，大者如山。」等。[18]由此可見其形象不乏有巨大、巨獸，又描寫其大如山、吞吐之間能夠吃掉一艘船、造就大雨沛然而下，甚至也在記載中提及其為「胎生」。

除了形象上的描寫，亦有鯨豚擱淺時人們的反應與行動。《臺海使槎錄》中曾提到「……漁人云，大者約三、四千筋，小者亦千餘筋、皮生沙石，刀箭不入。有自殭者，人從口中入，割取其油、以代膏火。肉粗，不可食……。」[19]雖然誇張地描寫從口中而入的場景，但也能透過該資料，瞭解當時面對擱淺鯨豚，即有割取其肉來作為鯨油、並作點燈之膏火。

除了鯨油之外，鯨骨也被撿拾使用。這樣的例子並不特別，如林豪在《澎湖廳志》以及胡建偉《澎湖紀略》都曾提及 1757 年（乾隆 22 年）擱淺在沙灘上之鯨魚，其魚骨被拿來作為澎湖廳署的支門，並提及

頁 240、291-292；〔清〕沈茂蔭，《苗栗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1894 年成書），頁 100、128、253；〔清〕周璽，《彰化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1830 年成書），頁 384；〔清〕吳子光，《臺灣紀事》（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成書時間不詳），頁 12。

[17] 〔清〕周鍾瑄，《諸羅縣志》，頁 240。

[18] 〔清〕朱仕玠撰，《小琉球漫誌》，頁 63。

[19] 〔清〕黃叔璥，《臺海使槎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1722 年成書），頁 66-67。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其脊骨也能作為碓臼使用。[20]可知除了肉與脂肪之外，巨大且堅固的鯨魚骨骼，也成為了能就地取材的工具之一。

除「海翁」之外，還存在著被稱呼為「蜈魚」、「海豎」的類別，並與「海翁」之間相區別。根據《臺海使槎錄》所述「蜈魚，俗呼海豎，頭似豬，大則千餘觔，小亦五、六百觔，常於水面躍起，高丈餘，噴水如雪，漁人見之即避。」[21]由此可知，被稱作為蜈魚者，又有海豎（海豎）之稱，特徵為頭部似豬，且同樣會躍出水面，更具備噴水的性質，即具備所謂「噴氣孔（blowhole）」的鯨豚類特徵。[22]《澎湖紀略》更提及其「狀如海翁，其大次之」只是體型上略輸海翁而已。[23]透過這點來進一步分析，海翁在文獻中往往小者千餘斤、大者則可以到萬餘斤之間，兩者可見於體型上的差異。[24]雖然以上述蜈魚的特徵來看，確實有鯨豚的特徵存在，不過沒有直接史料能證明其確切的屬性，推測很有可能是體型、體重較為小的鯨豚類動物。[25]

---

[20] 原文為「……今澎署大門尚有支門魚骨一條，長數尺、大數把；其脊骨可以作碓臼，兩眼亦空無目珠。澎人云：此尚是鰌之小者也。」引自：〔清〕胡建偉，《澎湖紀略》，頁 182。

[21] 〔清〕黃叔璥，《臺海使槎錄》，頁 67。

[22] 這樣具備噴氣孔換氣形式，是鯨目之中鯨豚類所具備的，噴氣孔是位於頭頂的鼻孔，透過其來進行呼吸，且在吸氣之前會有爆炸性的呼氣（噴氣、噴水）。參考：馬克・卡沃達（Mark Carwardine），《鯨與海豚圖鑑》（臺北：貓頭鷹，1997），頁 12-16。

[23] 〔清〕胡建偉，《澎湖紀略》，頁 182。

[24] 雖今昔在重量的測量、度量衡切換上，勢必存在著誤差，然經過換算後可稍微提供參考。史料所指出的海翁換算約在 1 公噸到 5 公噸（甚至超過）之間；蜈魚在史料中顯示為小則 5、6 百斤，大則千餘斤，換算約為 200-600 公斤之間。以其所指的體型來看，確實大型成年鯨類的體重皆在 1 公噸以上，大者則有如藍鯨（*Balaenoptera musculus*）約 100-120 公噸，弓頭鯨（*Balaena mysticetus*）約 60-100 公噸等，小者如小露脊鯨（*Caperea marginata*）的 3-3.5 公噸；而蜈魚方面，如若以鯨目下的海豚科、鼠海豚科等來作參考，體型差異較大，呈現在 30 公斤到 1 公噸（或超過）不等。參考：國立臺灣大學數位人文研究中心，「度量衡單位換算系統」（2011）：http://thdl.ntu.edu.tw/thdl_tool/weight_measure/，擷取時間：2021 年 5 月 17 日；馬克・卡沃達，《鯨與海豚圖鑑》，頁 40-41、48-49、68-69、144-145、172-173、236-237。

[25] 根據楊鴻嘉在 1976 年的調查，小型鯨豚常常有「鯣」的俗稱存在，如小抹香鯨（*Kogia breviceps*）有「油鯣」；里氏海豚（*Grampus griseus*）又名「雨傘鯣」、「和尚鯣」；虎鯨（*Orcinus orca*）也有俗稱「油鯣」；寬吻海豚屬（*Tursiops*）又名「烏鯣」等。然這些俗稱自何時開始較難以查證，不過從清代的記載來看，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透過上述 18 到 19 世紀的史料中，可見人們眼中觀察到的鯨豚，以及因為擱淺原因，留下了相關的接觸史，並呈現對於鯨豚的認識與想像。雖然有不少來自清代在臺或是短期來臺的地方官員、文人之手，但也藉由他們的文字，記錄下當地的鯨豚認識與互動。

不過 19 世紀開始，留下紀錄者不只有清代官員或文人雅士。1864 年史溫侯將在臺灣搜集到的鯨骨們寄到了大英博物館，並由當時在大英博物館就任動物管理員的格雷（John Edward Gray，1800-1875）進行鑑定。[26]這一個 1862 年擱淺在臺灣的鯨豚骨骸，一路輾轉到了史溫侯，以及遠在英國的格雷手中，進入了當時博物學鑑定的軌道，並被命名為「Balaenoptera swinhoei」（史溫侯鯨）。[27]在臺灣，擱淺鯨豚們不只是神祕的海洋生物，牠們成為博物學中建立新知識的橋梁。

實際上史溫侯的鯨豚擱淺記載並非只有一次，早在 1862 年他所發表的〈福爾摩沙島上的哺乳動物〉（*On the Mammals of the Island of Formosa (China)*）一文中就指出，他雖未在此次收集到海洋哺乳動物，不過由於臺灣和中國沿海生物生態接近的前提下，對物種的特殊性並不抱太大的期待，但他也曾聽聞有一隻巨大的鯨魚，大約 60 英尺長，擱淺於臺灣府（Taiwanfoo）下方的沙嘴上，並認為這一物種可能和 5 月期間會出現在南澳（Namoa）海峽附近的某種鬚鯨屬（Balaenoptera）相同。[28]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蜈魚」一詞與後續出現的「鯨」俗稱可能有所相關。陳光祖則推測「蜈魚」有可能是指在臺海域出現、屬於海豚科的短肢領航鯨，但同時也有可能是其他小型鯨目動物。參考：陳光祖，〈試論臺灣各時代的哺乳動物群及其相關問題——臺灣地區動物考古學研究的基礎資料之一（下篇）〉，頁 410-413；楊鴻嘉，〈臺灣產鯨類之研究〉，《臺灣省立博物館科學年刊》，19 卷（1976 年 12 月），頁 131-178。

[26] Bo Beolens, Michael Watkins, and Michael Grayson, *The Eponym Dictionary of Reptiles*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1), 107；John Edward Gray, “ Notice of a New Finner Whale from Formosa,” *The Annals and Magazine of Natural History: Zoology, Botany, and Geology* 16, no. 93 (1865): 148.

[27] 雖然當時格雷取得部分鯨骨，認為有可能是新種，並命名為「*Balaenoptera swinhoei*」，但在 2018 年經過 DNA 的鑑定下，進一步證實此被名為「*Balaenoptera swinhoei*」的標本，實際上是一隻北太平洋常見的大翅鯨，但格雷在標本數不完整的狀況之下，有誤判尚屬正常。參考：陳瑩，〈鬚鯨一家親：全基因體分析揭露鬚鯨混血與種化歷史〉，「鯨群網頁」：https://haideeya.wordpress.com，擷取時間：2021 年 5 月 21 日。

[28] 原文中有提及：「I heard of a large Whale, some 60 feet long, that was stranded on a

除了上述兩例之外，還出現推測為「Megaptera kuzira」（註：大翅鯨、又稱座頭鯨）[29]的物種，這一個擱淺的事件，史溫侯在文中有詳細的記載：

> 1865 年 3 月在打狗的某一天，我被叫喊「海翁（Hai-yang）」（或稱為鯨魚）的聲音吵醒，然後聽說有一隻剛剛擱淺了。我穿越港口前往現場，在路途上，我遇到了好幾隊的中國人裝載著那隻可憐怪獸的一部分而歸。當我到達現場，我發現下巴旁以及部分背脊幾乎沒留下什麼了，甚至這些都正被砍或搶奪。（One day at Takow in March 1865 I was roused by the cry of "Hai-yang" (or Whale), and heard that one had just been stranded. I crossed the harbour and made for the spot. On the road I met several parties of Chinamen returning laden with portions of the poor monster. On arriving at the spot I found little left beside the jaw and a part of the back ; and even these were being hacked and fought over.）[30]

根據史溫侯後續的敘述，他認為這隻鯨豚很可能是生病或者迷路，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sand-spit below Taiwanfoo, and demolished by the natives.」，這隻鯨豚很可能是被當地人破壞，也可能是對其進行肢解。此外，推測此次擱淺案例的時間，根據史溫侯之行程，1861年的7月到11月間，他寄居在南部接近臺灣府處，12月到隔年的5月間則停留在淡水，更表示這段期間他相當盡力在自然史事業上。文章後續發表在1862年的下半年，因此雖無具體寫出這隻鯨豚擱淺的時間，但很可能是在這段時間裡所聽聞的事蹟。參考：Robert Swinhoe, "On the Mammals of the Island of Formosa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Zo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1862) : 348；陳政三，《翱翔福爾摩沙：英國外交官郇和晚清臺灣紀行》（臺北：五南出版，2015），頁160-167。

[29] 這邊所指的「*Megaptera kuzira*」，可能是指「*Megaptera novaeangliae kuzira*」，被認為是大翅鯨（*Megaptera novaeangliae*）下其中之一的亞種（subspecies）。目前學界所認為的大翅鯨亞種主要有三：庫吉拉大翅鯨（*M. n. kuzira*）主要分佈於北太平洋；新英格蘭大翅鯨（*M. n. novaeangliae*）則主要分佈於北大西洋；最後澳洲大翅鯨（*M. n. australis*）則分佈於南半球。參考：陳瑩，〈所以說大翅鯨到底有幾種？〉，「鯨群網頁」：https://haideeya.wordpress.com，擷取時間：2021 年 5 月 21 日；Jennifer A. Jackson et al., "Global Diversity and Oceanic Divergence of Humpback Whales （*Megaptera novaeangliae*）,"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281, no. 1786 (2014): 8.

[30] Robert Swinhoe, "Catalogue of the Mammals of China (South of the River Yangtsze) and of the Island of Formosa," *Proceedings of the Zo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1870): 652-53.

因為牠在靠近海岸的地方徘徊，且正巧在小港口入口處的岩石周圍。當時則有位馬尼拉人（原文 Manillaman，可能是指 Manilamen）[31]觀察到牠，並隨之拿了一把鐵鎚，衝進了水裡，重重地攻擊了牠的頭部，之後再招呼一些中國人協助將之弄上岸。史溫侯進一步取得了可靠依據：這隻鯨豚長約 20 英尺，並且牠的背部沒有鰭（fin）。在史溫侯觀察的過程中，陸續有人取走鯨豚身上的胸鰭、尾巴等部位，而他則是取走了一片鯨鬚（baleen），並將之送往大英博物館。不過很可惜的是，不如 1864 年的鯨骨們，這一次鯨鬚樣本並沒有順利抵達該處。但在觀察鯨鬚、以及其他特徵後，史溫侯認為該物種應屬於「Megaptera（大翅鯨屬）」，且可能跟在南日本海記載到的物種一樣。[32]

在 19 世紀透過史溫侯之手，採集標本、樣本，並記載、發表在當時的各種博物學、動物學期刊，其筆下亦記載了當地人與鯨豚的互動。與清代地方志史料不同處，是對物種的分析與分類更加鉅細靡遺，而這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31] 該處原文為 Manillaman，推測可能為馬尼拉人（Manilamen 或 Manila men），也就是指來自菲律賓的原住民。這一名詞涉及在西班牙殖民時期，來自菲律賓的印地安（西班牙語：indios）、原住民，而在 16 世紀跨太平洋貿易開始後，大型帆船上就載著西班牙水手，以及相當多數的印地安水手（indio，但應指來自菲律賓的水手）。而這些來自菲律賓的水手在這段時間內移民北美、墨西哥，並在當地建立定居點。上述 16 世紀開始的早期菲律賓水手、以及後來 19 世紀的追隨者，在英語世界裡被稱之為“Manilamen”，且英語文本資料中，來自菲律賓者，包含了政府或私人的水手、其他勞工移民等，都被記錄為所謂的“Manillamen"，反而較少記錄為菲律賓島民（Philippine Islanders）。有趣的是這群 Manillamen 曾在 19 世紀中葉參與美國在北極、太平洋的捕鯨事業，梅爾維爾的《白鯨記》內就曾記載船長亞哈專用小艇的水手，皆為馬尼拉原住民。而臺灣在西班牙治理時期，就已經出現被徵召來北臺灣服勞役的菲律賓原住民，他們其中也有不少因備受西班牙當局嚴酷的對待，因而選擇逃離，前往南部荷蘭人統治的區域、或者想要逃出海的例子，當然也有可能是遭遇船難而短暫停留臺灣。不過史溫侯在內文中的描述不多，目前沒辦法進一步確認這一位“Manillamen”的身分，或者他待在臺灣的原因。參考：Filomeno V. Aguilar Jr., “"Filibustero", Rizal, and the Manilamen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hilippine Studies* 59, no. 4 (2011): 442-43；Kale Bantigue Fajardo, “Manila Men,” in *Asian American Society: An Encyclopedia*, ed. Mary Yu Danico (Sage Publications, 2014), 655；李毓中，〈十七世紀跟著西班牙人來到臺灣「菲律賓外勞」〉，《歷史月刊》，231（2007 年 5 月），頁 21-23；陳宗仁，〈1632 年傳教士 Jacinto Esquivel 報告的解析——兼論西班牙佔領前期的臺灣知識與其經營困境〉，《臺灣文獻》，61：3（2010 年 9 月），頁 21-24。

[32] 即前所述之「*Megaptera kuzira*」。Robert Swinhoe, “Catalogue of the Mammals,” 653.

些擱淺在臺灣沙灘上的鯨豚，也被納入了當時的博物學體系中，其命名方式不像「海翁」、「鰌」等通俗的稱呼，而是透過所取得的樣本進行鑑定，更進一步分類出所屬的物種，透過林奈二名法下的生物分類系統，給予學名（scientific name）。透過鯨豚化石到擱淺記載、早期博物學的鑑定；從臺灣四周海洋，一直到擱淺陸地上的鯨豚故事，臺灣海洋的歷史生態面貌，包含著人們對牠的認識、想像，甚至是「利用」。

參、 漢人與原住民族鯨豚傳說與想像

一、化身大鯨：漢人鯨豚傳說

人們除在面對鯨豚，透過文字記錄的生物認識外，與鯨豚相關的傳說，同時也透露對鯨豚的想像，更化作為一種海洋想像的體現。而在漢人的鯨豚傳說中，最具盛名的，即鄭成功與鯨之間的故事，如《臺灣外記》就如此描述鄭成功戲劇性誕生的過程：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 ……甫出門，見天昏地黑，雨箭風刀，飛沙走石，鼓浪興波，令人震怖。天明，聞說海濤中有物，長數十丈，大數十圍，兩眼光爍似燈，噴水如雨，出沒翻騰鼓舞，揚威莫當。……一官妻翁氏正在肚疼昏迷間，夢同眾人岸上觀大魚跳躍，對懷直沖，驚倒。醒來即分娩一男。[33]

這條海中之物「長數十丈，大數十圍，兩眼光爍似燈，噴水如雨，出沒翻騰鼓舞，揚威莫當」若以體型長數十丈換算約 32 公尺左右，且有噴氣孔換氣的生物特性，極有可能是大型鯨類的想像。[34]而這似鯨豚的大型海中生物在鄭成功誕生之前，於海中翻騰鼓舞，鄭芝龍的妻子翁氏則夢見與眾人觀看大魚奔騰奇景，且這條大魚竟然還向著翁氏懷裡直

---

[33] 〔清〕江日昇，《臺灣外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成書年代不詳），頁 8-9；周育聖，〈臺灣神話傳說與故事中的海洋文化研究〉，頁 182-186。

[34] 換算標準：1 丈為 10 尺，10 丈為 100 尺，1 尺於清代約為 0.32 公尺，則 10 丈約為 32 公尺左右。參考：陳慧先，《丈量臺灣：日治時代度量衡制度化之歷程》（新北：稻鄉，2014），頁 39-43。不過實際上能長 32 公尺的鯨豚生物，很可能就只有最大型的藍鯨，一般成年的體長約 21-22 公尺。參考：馬克・卡沃達，《鯨與海豚圖鑑》，頁 68-69。

衝，她驚倒後醒來即生下鄭成功。

另外在《臺灣紀事》裡則是寫道：「天明，諜者言島中有鯨鯢長數十丈，夭矯起波間，金光閃爍，噓氣如雷鳴，風濤暴漲，隱隱有金戈鐵馬之聲不絕，舟航糜碎，溺入海盡死，竟夜哭聲震天……。是夕，成功生，人奇之。」則是直接將此海上之獸「鯨鯢」寫出。[35]

除了誕生時的大鯨意象外，鯨豚甚至是能被人類所騎乘的巨獸。於李元春《臺灣志略》中則記有「……凡成功兵到處，海水皆暴漲。順治辛丑攻臺灣紅毛，先夢見一人冠帶騎鯨，從鹿耳門入；未幾成功突至，紅毛遂遁……」[36]這一個驅駕巨獸的人類，自然非普通人，而是攻取熱蘭遮城、建立明鄭政權的鄭成功，他甚至有「東海大鯨」之稱。[37]

這一個龐然大物能成為他底下的坐騎，很可能即是因鯨被視為海中體積最巨大者，該形象與鄭成功海上霸主形象不謀而合。其實這樣擅長於海上的海盜、海賊身分，在明清時期官方眼中，往往有相當大的負面意義存在。[38]明、清兩代開始「鯨鯢」一詞便有稱沿海海盜、海賊之意，而「鯨鯢」不只反映了縱橫海上的他們，尤其在清代更指涉鄭成功與鄭氏政權。而這些「鯨鯢不波」、「掃蕩鯨鯢」、「施大將軍琅掃除蛟鱷鯨鯢之怪」等說法，能從另一角度透視明、清兩代治理者面對海上盜賊們的困擾，「鯨鯢」成為汪洋大海上不受官方控制、無法掌握的另一種負面象徵。[39]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

[35]〔清〕吳子光，《臺灣紀事》，頁 35。

[36]〔清〕李元春，《臺灣志略》（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成書年代不詳），頁 86。

[37]「鄭成功起兵猖獗，有僧識其前因，語人曰：『此東海大鯨也』。問：『何時而滅』？僧曰：『歸東即滅矣』。凡成功兵到處，海水皆暴漲。」參考：〔清〕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1752 年成書），頁 561。

[38] 翁佳音，《近代初期臺灣的海與事》（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22），頁 232-234。

[39] 林豪，《澎湖廳志》，頁 445；〔清〕邵陽魏源撰，〈嘉慶東南靖海記〉，收入《海濱大事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5，成書年代不詳），頁 81；〔清〕劉鴻翱，〈綠野齋集選錄〉，收入《臺灣關係文獻集零》（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2，成書年代不詳），頁 76；未詳，《清耆獻類徵選編》（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7，成書年代不詳），頁 1395；曹銘宗，《花飛、花枝、花蠟仔：臺灣海產名小考》（臺北：貓頭鷹，2018），頁 179-182。

除了表現在鄭成功，以及海盜、海商的形象之外，過去戴潮春軍師劉阿甿（或稱為阿妹），即曾指稱交手之清代將領林向榮前世為「鯨魚精」，並善用這樣的動物形象，以魚進入水（鹽水港）中難以制服，但魚入斗（斗六）中則即將自我潰敗等，透過結合陸地上之臺灣地名，來影響軍心與民心。[40]總體可見，民間或官方對於鯨之形象寄託，反映著海洋想像，也確實是臺灣作為海島的例證。

二、海祭與鯨豚：原住民族鯨豚傳說

（一）《鯨祭》與阿美族鯨豚傳說

除了漢人對於鄭成功以及海盜的鯨類想像外，原住民也存在鯨豚相關的傳說故事，與漢人之間洽有相似點，但也有不少歧異之處。以下就阿美族、卑南族為例，來探討其鯨豚傳說與故事。[41]

咚咚叩咚、咚咚叩咚，海的祭典，伴隨太鼓
海的大王、鯨的祭典，伴隨歌曲，跳舞吧、唱歌吧！
咚咚叩咚、咚咚叩咚，咚咚叩咚、咚咚叩咚，海的祭典，拍子一致
海的大王、鯨的祭典，直到早晨來臨，跳舞吧、唱歌吧！
咚咚叩咚、咚咚叩咚
（ドドンコドン、ドドンコドン、海のおまつり、太鼓に合わせて
海の王様、鯨のおまつり、唄にあはせて、踊れよ、唄へよ
ドドンコドン、ドドンコドン、ドドンコドン、ドドンコドン
海のおまつり、拍子をそろへて
海の王様、鯨のおまつり、朝が来るまで、おどれよ、うたへよ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40] 林豪，《東瀛紀事》（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1880 年成書），頁 61。

[41] 關於原住民的口傳故事，日治時期曾透過統治者的調查與記錄，進一步的保存於書面的資料當中，其中也包含了許多的傳說故事。參考：張隆志，〈從「舊慣」到「民俗」：日本近代知識生產與殖民地臺灣的文化政治〉，《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 2 期（2006 年 11 月），頁 38-39；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番族調查報告書（第一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9 年），編序頁 3。

ドドンコドン、ドドンコドン）[42]

日治時期活躍在實業界與兒童文學的西岡英夫，寫下《鯨祭》童話文學，而後經過中山侑改編為劇本，1940 年於臺灣進行廣播放送，上述的歌謠就是劇本中的一段插曲。而這一篇劇本，地點就設定在臺灣臺東廳下里壠蕃社。[43]此童話故事的靈感與來源，實際上來自於流傳在阿美族部落內的傳說之一，也就是一則極具臺灣色彩的故事，而這故事裡的主角之一，是一隻大鯨魚！[44]

劇本的內容以一位老人與少年的對話作為開場，他們談論到蕃社內舉辦鯨祭的緣故，並回憶這個來自於久遠的傳說。故事的大意為一位蕃社的青年名為 Maciwciwt（マチヱチヱット），在一次釣魚時差點溺斃，隨後被鯨魚所救，並坐在鯨魚的背上，熱情的鯨魚帶著他穿越大海來到名為極樂島的島嶼上，青年在島上度過了愉悅的時光，最後再次乘上鯨背回到了蕃社。為了感念鯨魚的救命之恩，按照其意準備供品，並舉辦鯨祭來答謝。而實際上這一個奇幻的故事，在阿美族裡也有各種傳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42] 本劇於 1940 年 2 月 18 日進行轉播。參考：〈子供の時間（臺北六・〇〇）鯨祭り（西岡英夫作、中山侑脚色）臺北童話劇協會〉，《臺灣日日新報》，1940 年 2 月 18 日。引用自：西岡英夫，《放送童話劇：鯨祭》（地點未詳：出版未詳，1940），頁 1-2。

[43] 雖然在此處西岡所設定的劇本地點為里壠蕃社，不過目前沒有過多的資訊可以得知此「里壠蕃社」所指為部落之名，或是指里壠支廳下的部落。就目前所得資訊，並無所謂字面上「里壠蕃社」的存在。「里壠」為現今臺東縣關山舊稱，在清代即有平埔族與阿美族於此地居住、開墾，里壠庄主要為平埔族遷入與居住處，阿美族則主要在德高班寮與雷公火兩社。根據 1918 年《蕃社戶口》的調查，其中在臺東廳阿美族之分類下的卑南阿美族部族，於雷公火社、里壠庄皆有不少阿美族之戶口與人數，也因此除了雷公火社以外，里壠庄在當時很可能也有阿美族人口存在。更進一步根據行政區制劃分來看，1914 年間德高班寮社就併入里壠庄內，與雷公火社一同歸屬里壠區，也因此「里壠蕃社」很可能指的是併入里壠庄內的德高班寮社阿美族，又或者有可能指同屬里壠區下的雷公火社。參考：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警察本署，《蕃社戶口》（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警察本署，1918），頁 34；施添福總編纂，《臺東縣史（阿美族篇）》（臺東縣：臺東縣政府，2001），頁 121-134；施添福，《關山鎮志（下冊）》（臺東縣：臺東縣關山鎮公所，2002），頁 62；許先媜，〈臺東縣關山鎮地方發展的特色〉（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碩士論文，2007），頁 23-24。

[44] 游珮芸，《日治時期臺灣的兒童文化》（臺北：玉山社，2007），頁 154-156；林文寶、邱各容，《臺灣兒童文學史》（臺北：萬卷樓，2018），頁 26-27。

說版本存在。[45]

西岡與中山侑合作的這部《鯨祭》劇本，改編於阿美族，但與阿美族有文化互相影響的撒奇萊雅族（Sakizaya），亦有類似的傳說故事。《鯨祭》一文中提到的極樂島是一個只存在女王與侍女的地方，沒有任何的男性。而這樣的極樂島，源自於阿美族對於女人島（Falaysan／Falisan）的傳說故事。如此只存在女人的島嶼（或部落），其實也在其他的原住民口傳文學中出現，只是大多為山中所存在的女人社或部落，但阿美族的女人島卻無庸置疑的是座海中異島，有更深的「海洋」意涵。而在各種版本的故事中，海中之王「鯨魚」的身影頻繁出現，作為大海與人之間的連結，甚至牠成為此後阿美族海祭的由來之一。[46]

日治時期阿美體系的調查中，其中里漏社、歸化社、馬蘭社、奇密社與太巴塱社皆有鯨豚、女人島的傳說，只是在細節上存在些許差異。[47]與《鯨祭》內容最為相似者，為當時被歸屬於阿美體系的歸化社，不過實際上應為撒奇萊雅族，很可能因歷史因素，撒奇萊雅族與阿美族之間文化相互影響，由女人島與鯨豚的傳說便可得知其一。[48]

根據歸化社的傳說，有位叫做 Maciwciw（マチュチュ）的人在捕魚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45] 西岡英夫，《放送童話劇：鯨祭》，頁 1-28。

[46] 鄧郁生，〈日治時期阿美族女人島傳說的異域論述〉，頁 117-150；范玉廷，〈臺灣原住民族口頭傳說之島嶼試探——兼論 sanasai 的真實與想像問題〉，頁 194-217；李宜靜，〈阿美族海祭神話與祭儀之流變〉，《康寧學報》，10（2008 年 6 月），頁 242-251。

[47]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番族調查報告書（第一冊）》，頁 87-89、93-94、216-217；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番族調查報告書（第二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9 年），頁 67-68、146-147；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二卷）》（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0 年），頁 18-20；達西烏拉彎・畢馬，《阿美族神話與傳說》（臺中：晨星出版，2003），頁 154-161、230-235。

[48] 1878 年噶瑪蘭族（Kavalan）與之聯合對抗清軍，此稱之為加禮宛事件，事件後部分的撒奇萊雅族人隱居於阿美族聚落中，而歸化社則是事件後所改稱的部落名。撒奇萊雅族於 2004 年即開始民族正名運動，在 2007 年獲得官方承認，自此正名為第 13 個臺灣的原住民族。參考：陳俊男，〈撒奇萊雅族研究史與評析〉，《政大民族學報》，第 26 期（2007 年 12 月），頁 145-150；田哲益（達西烏拉彎・畢馬），《撒奇萊雅族神話與傳說及火神祭》（臺中：晨星出版，2019），頁 4-5。

時不小心被沖到海上，並於海上漂流。直到漂流到一座島嶼的岸上，上岸後發現島上只有女人，並無任何的男人，此地被稱之為女人島（Falaysan），Maciwciw 在此受到熱情的招待，在島上享樂了一陣子，思鄉之情卻越發濃烈，悲傷的他跑到海邊大喊，接著出現與鯨魚相遇的故事：

> ……此時，水面突然出現一條大鯨魚，對 Maciwciw 說：「難怪你要感傷，爬到我的背上吧！我帶你歸返故鄉。」Maciwciw 高興地立刻祭祀神靈，並跳上鯨背。鯨魚迅速地衝破白浪，轉眼間就來到了故鄉的岸邊。Maciwciw 只覺離鄉數年，但故鄉卻完全變了樣……。鯨魚將 Maciwciw 送上岸時曾說：「五天後要帶著五頭豬、五瓶酒、五串檳榔到海邊祭祀。」五天以後，Maciwciw 依約前往海邊祭祀鯨魚，據說鯨魚就在那個時候把造船術傳給了蕃人。[49]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由上述歸化社的版本可見，鯨魚在最後出現，並拯救了 Maciwciw，也有了後續海邊祭祀鯨魚的活動。雖然這與《鯨祭》一開始便出現的鯨魚大王有所出入，但從兩邊的男主角 Maciwciwt（マチェチェット）與 Maciwciw（マチェチェ）之名稱相仿，且同樣在島上受到熱情的招待等，仍能發現相似之處。

不過關於女人島與鯨魚的傳說有各種版本存在，如阿美族奇密社有關於乘鯨到女人島的故事中，則是一名叫 Sadafan（サダバン）的人，誤將鯨背視為島嶼，只好跟著鯨魚來到了只有女人的島嶼。一開始受到熱情招待，但隔天醒來卻發現自己被關在豬舍，過著衣食不足的生活，最後 Sadafan 逃離豬舍來到海邊，遇到了原來的那隻鯨魚，鯨魚幫助 Sadafan 回到了故鄉。待在島上才幾天的日子，一回故鄉卻物是人非，時間早已過了相當漫長的歲月。但為了報答鯨魚的相助，仍準備宰豬、蒸糯米，帶到海邊進行祭祀。故事的最後更提及「……是時波浪打到岸邊捲走了祭物。現在粟之除草祭時，頭目都先煮鹽水，宰豬，搗麻糬，然後將之放入河流以祭祀鯨魚，即源於此。」也因此說明與鯨魚相關的

---

[49]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番族調查報告書（第一冊）》，頁 93-94。

傳說，實際上已經融入了部落裡的日常祭禮儀式。[50]

在阿美族里漏社故事中更明確地寫出了鯨魚的名字，甚至牠成為神靈的象徵。《番族調查報告書（第一冊）》有關里漏社獨木舟的傳說，記載社中有三艘古老的獨木舟，來源說法眾多，其中有紀念祖先乘坐此獨木舟而來的說法；也有一說是指一青年遇到神靈 Sayning，Sayning 教導他造船的方法，並明示青年帶著祭品前來拜訪。此後青年與部落承襲了造船術，並持續這樣的船祭，而這裡的「Sayning」並沒有過多的描述或形象。[51]不過，在 1915 年的《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二卷）》中，獨木舟的傳說結合了女人島的故事。同樣是名為 Maciwciw 的青年被巨鯨吞入肚中，被從鯨的體內排出後，上岸到女人島，最終被一隻名為「Sayning」的大魚所救，也因此前述神靈 Sayning 化身為一隻大魚，並拯救 Maciwciw 回到家鄉，獨木舟則是為了紀念此事而留存。[52]

而透過上述的各種版本，雖然故事詳細內容有所分岐，也可見有相互影響的部分，但不管是哪一種版本，各社均描寫乘坐在鯨或大魚的背上，以及其對於男子的救命之恩，所導致後來祭祀的儀式與行為，也就是所謂的「海祭」。[53]

關於阿美族的海祭，口傳留下的故事眾多，且根據地區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導致難以考證其真實的由來。目前解釋該海祭的由來大約有兩種類型：一種是本文未提及的海神幫助對抗美崙山巨人的故事系列；另一種即本文所提及的鯨魚與女人島的系列。前者並沒有固定的形象，後者則是明確的指出如「鯨魚」或「大魚」的存在。[54]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

[50]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番族調查報告書（第二冊）》，頁 67-68。

[51]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番族調查報告書（第一冊）》，頁 87-89。

[52] 1926 年 3 月底為了紀念東部鐵道全線通車的緣故，在花蓮港廳物產展覽會展出許多珍貴的古物，且皆是與原住民族有關係，其中里漏社的獨木舟亦作為其社祖先乘舟到此的古物展示品之一。參考：〈花蓮港廳物產展中の珍品考古資料のかずく〉，《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3 月 30 日，日刊 5；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二卷）》，頁 18-20。

[53] 也有一些版本的調查提及到可能是「海豚」。詳見：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調查、楊南郡譯註，《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臺北：原民會，2011），頁 596-597。

[54] 李宜靜，〈阿美族海祭神話與祭儀之流變〉，頁 235-239；達西烏拉彎・畢馬，

不論真正的由來為哪一種，東海岸地區原住民與海洋之間的關係，無疑相當密切。雖然在現今臺灣並沒有舉行字面上所謂的「鯨祭」，也就是如日本部分地區專門祭祀鯨魚的活動，不過追溯臺灣「海祭」的祭祀由來，卻能發現其中暗藏著鯨魚與大海的故事，如今已隱性的化約，存在今昔阿美族海祭文化當中。

現實中阿美族對於鯨豚的認識到底有多少？在 1915 年《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二卷）》中，針對於花蓮港廳之下的阿美族海上漁獵的相關調查，提及靠近海濱的蕃社會進行海上的漁撈。該社所認識的魚類、捕獲的魚類有如鯨魚、鯊魚、平鰺、白帶魚等等，其中所提包含了「鯨魚」。雖然無法進一步得知其如何捕獲、如何使用、是否為規律性的捕捉，不過能確定的是他們對於鯨魚的認識已非只有傳說的形象，現實中也有所接觸，甚至牠們很可能作為漁獲而曾被捕撈。[55]

（二） 卑南族鯨豚傳說

卑南族最廣為人知的祭典之一，即猴祭。不過卑南族實際上也有不少與海洋相關的傳說，也有所謂的海祭儀式存在，尤其留存在卑南南王部落當中。[56]關於 1913 年《番族調查報告書（第一冊）》對於卑南社所做的調查中，提及在過去綠島與臺灣之間有座橋，某天橋被砍斷，有位年輕人被惡作劇而留在島上，最後岸邊出現了一隻鯨魚，並願意帶其回家。牠對年輕人說「此後每年得帶著粟到海邊來祭祀我」，也因此在每年割粟儀式結束後年輕人都會帶粟來祭拜，這也成為了卑南社的歲時祭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阿美族神話與傳說》，頁 154-161；周育聖，〈臺灣神話傳說與故事中的海洋文化研究〉，頁 124-127；周泳恩，〈臺灣民間故事的「海洋幻想」研究〉（臺中：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所碩士論文，2015），頁 217-223。

[55] 不過目前關於「鯨魚」魚種的海上狩獵資料只有此冊報告書提及，其他舊慣調查資料目前未見詳細魚種說明。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二卷）》，頁 36-37。

另根據西村之一曾探討自日治時期日本漁業移民所引入的「鏢旗魚」技術，與東部地區阿美族之間的接觸與傳承關係，可見阿美族除傳統漁業狩獵外，曾受日治時期漁業技術文化影響之例。參考：西村一之，〈臺灣東部的漁撈技術的傳承與「日本」——於近海鏢旗魚盛衰之間〉，《臺灣文獻季刊》，55：3（2004 年 9 月），頁 117-144。

[56] 姜柷山、孫民英、林娜鈴等著，《臺東南王社區發展史》（臺東：臺東縣臺東市南王社區發展協會，2016），頁 28-38、57-64。

儀之一。[57]

不過並不是所有的卑南族在儀式與傳說上皆相同。與阿美族的狀況相似，因有地緣、環境與氏族不同的狀況下，而導致在口傳故事、儀式上都有相同或歧異處。上述的鯨魚與粟的故事只是其中一種版本，尤其卑南系統下的卑南社又再分為南、北部落，氏族也區分南北。也因此，關於小米祭的由來其實存在多種說法，祭拜的方位與儀式也有差異，但可以確定的是，鯨豚也作為卑南聚落小米祭（或稱為海祭 Mulaliyaban）的淵源之一。[58]

首先關於小米祭的由來，就有如何取得、為何祭祀上的差異。關於這類的傳說大約分成幾種，一為取粟於蘭嶼，再帶回臺灣；二為由都巒山等鄰近處所取得粟；三則為受困於綠島，之後因受助於鯨魚，以粟行感謝之祭典。[59]前兩者比較偏向於如何取得粟的過程，為了感謝而行相關的祭祀活動；有關於鯨魚拯救受困者的版本，則無提及如何取得粟，但仍作為祭祀原因的流傳版本之一。而實際上，上述的版本隨著南北部落、氏族的差別，形成不同的流傳版本，甚至影響祭祀活動的差異。

關於鯨豚的版本傳說，主要則是出現在南部落中阿拉西斯（Arasis）家的口傳故事。故事為一名叫做 Takyu 的人，刻意欺騙族人並偷取粘糕，將粘糕帶往 Sanasan（即火燒島、綠島），吃完以後再回到家中，其親人知道了他不良的行為，便將之騙到 Sanasan 打獵，趁機離開並切斷了 Sanasan 與家鄉之間的橋梁，Takyu 因此而受困於 Sanasan，但隨後出現拯救他的，是一隻名為 Barawis 的魚：

> 此時有 Rewadwad 與 Rebanban 二神憐憫 Takyu 被遺棄在孤島，便命令一隻叫做 Barawis 的魚送他回到陸地。Barawis 奉命行事……牠向 Takyu 說道：「吾奉二神之意送汝至陸，汝若感念二神之

---

[57]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番族調查報告書（第一冊）》，頁 250。

[58] 關於卑南系統南、北部落以及祭祀儀式上的差異，詳細資訊可參考：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調查、楊南郡譯註，《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頁 438-443。

另外參考姜柷山、孫民英、林娜鈴等著，《臺東南王社區發展史》，頁 14、57。

[59] 達西烏拉彎・畢馬，《卑南族神話與傳說》（臺中：晨星出版，2003），頁 144-149；姜柷山、孫民英、林娜鈴等著，《臺東南王社區發展史》，頁 28-38、57-64。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 恩，於小米祭時便供奉小米和檳榔，吾則將汝之供祭物獻予二神。」言畢即消失蹤影。……此後小米祭時，他必定供呈小米和檳榔給 Barawis，後世以此為例流傳至今。[60]

雖然在上述的文獻中出現的是一隻名為「Barawis」的魚，但是其他的文獻中，則明確的指出了其具體「鯨魚」的形象，且沒有二神的存在，是直接感謝救助者鯨魚的版本，不過兩者都是屬於阿拉西斯（Arasis）家的流傳版本。[61]有趣的是，從阿拉西斯氏族內的傳說來看，可以發現與上一章節阿美族的女人島與鯨魚故事有高度相似處，尤其在海外島嶼、鯨魚或大魚的救助、帶領其回到家鄉，且日後形構出感念儀式等處相仿，也代表著部分有文化互相影響的可能性。

1935 年小川尚義《原語による臺灣高砂族傳說集》一書中針對阿美族馬蘭社所做的語言與口傳調查中，有一篇名為〈卑南人與鯨（卑南人と鯨）〉的故事。提及一卑南社人乘坐於鯨魚身上，而後鯨魚贈與了他四、五粒的粟，卑南社人回去播種以後粟生長得很好，之後為了感念鯨魚，便有帶著供物前往祭祀的祭典儀式。[62]雖然調查的為馬蘭社，但其流傳的故事卻說明卑南社與鯨之間的關係，而馬蘭社本身也存在鯨與女人島的傳說，在此可以發現兩者之間的文化交流與影響，而實際上馬蘭社與卑南社相距不遠，也因此對於鯨豚類的想像可能存在重疊。[63]

雖然對於鯨豚的想像與阿美族之間有相似的狀況存在，不過在卑南社的故事裡，卻特別強調小米、粟存在的重要性，也因此形構出該族海祭與小米之間的連結，作為其特色之一，這與阿美族對於鯨豚傳說中所祭拜的物品有著顯著的差異。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

[60]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二卷）》，頁 270-271。

[61] 關於直接描述為鯨魚拯救受困者的故事，詳細可參考：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調查、楊南郡譯註，《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頁 441-442。

[62] 小川尚義編著，《原語による臺灣高砂族傳說集》（臺北：臺北帝國大學言語學研究室，1935），頁 543-545；達西烏拉彎・畢馬，《卑南族神話與傳說》，頁 146-147。

[63] 周育聖，〈臺灣神話傳說與故事中的海洋文化研究〉，頁 127-128。

肆、 結論：豐富的生態與海洋想像空間

透過鯨豚在化石、文字史料與傳說記載的展現，進一步思考臺灣海洋史。首先，多元豐富的鯨豚化石蹤跡，以及各種樣貌的記載，人們對鯨豚的認識，甚至是利用，具體的展現臺灣作為一海島的存在。

曹永和曾提出「臺灣島史」的概念，強調臺灣作為一個海島的地理特色，海洋環境無庸置疑，是具臺灣性的代表，同時說明「歷史」是由「人」、「時間」、「空間」三種因素互動交織而來。[64]但，海洋作為一種媒介、載體，在同一個時空地點下，其實同時還存在許多的「非人動物（nonhuman animals）」，一直都存在漫漫歷史「大海」之中，牠們在歷史中呈現什麼樣貌，也與海洋史、臺灣史息息相關。從大海中鏡射鯨豚，反過來，再從鯨豚思考海洋。

藉由鯨豚，證實臺灣海島與生態的重要性，同時，也展現了更豐富且多元的面向。透過清代臺灣地方志的記載，以及史溫侯所連結的博物學體系、漢人與原住民的鯨豚傳說中，雖有共同的巨大海獸、神秘海獸的想像存在，但也有反映不同族群下的相似或歧異之處。如受明清政府影響而生的海盜與鯨豚連結，展現在鄭成功身上的大鯨想像，同時也與原住民傳說中騎乘大鯨的畫面重疊，在在顯示對海中巨大海獸的想像，有巧妙的雷同之處。騎乘鯨豚，在漢人想像中彷彿呈現人類主宰海洋的思考，同時「鯨」在明清官方中又有著捉摸不定的海盜聯想；而在原住民的傳說中，則有藉鯨豚親近海洋、敬畏海洋，同時與海共生的體現，甚至隱性化約為今日海祭的傳說之一。透過上述，可見臺灣鯨豚記載與想像的豐富多元，亦不失為海洋想像與寄託的展現。

臺灣豐富的海洋資源與生態環境，造就歷史文獻中鯨豚的多元面貌。同時鯨豚故事本身，也反映了海島臺灣生態與文化。人們如何看待鯨豚及海洋？如何想像這龐大的海洋生物？寄託想像於傳說故事、歷史記載之間，不同的族群在臺灣交會，呈現全然不同的面貌與遐想，融入於不同的年代、族群間，也化為臺灣海洋史的一環，印證著臺灣海島生態的富足。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

[64] 曹永和，〈臺灣史研究的另一個途徑——「臺灣島史」概念〉，《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2000），頁 445-449。

徵引文獻

一、報紙、史料

《聯合報》

《臺灣日日新報》

小川尚義編著，《原語による臺灣高砂族傳說集》，臺北：臺北帝國大學言語學研究室，1935。

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1752 年成書。

未詳，《清耆獻類徵選編》，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7，成書年代不詳。

江日昇，《臺灣外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成書年代不詳。

早坂一郎，〈臺南州新化地方の化石哺乳類（犀の齒の產出）〉，《臺灣地學記事》，3：10（1932 年 11 月），頁 108-109。

朱仕玠，《小琉球漫誌》，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57，1765 年成書。

西岡英夫，《放送童話劇：鯨祭》，地點未詳：出版未詳，1940。丹桂之助，〈新竹州竹南郡及臺南州新化郡產イルカ科脊椎骨化石（臺灣產化石雜記 VII）〉，《臺灣地學記事》，8：7（1937 年 9 月），頁 92-95。

吳子光，《臺灣紀事》，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成書時間不詳。

李元春，《臺灣志略》，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成書年代不詳。

沈茂蔭，《苗栗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1894 年成書。

邵陽魏源撰，〈嘉慶東南靖海記〉，收入《海濱大事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5，成書年代不詳。

林豪，《東瀛紀事》，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1880 年成書。

周鍾瑄，《諸羅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1717 年成書。

周璽，《彰化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1830 年成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胡建偉，《澎湖紀略》，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1，1771 年成書。
唐贊袞，《臺陽見聞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1892 年成書。
陳文達，《鳳山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1720 年成書。
陳培桂，《淡水廳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1871 年成書。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1852 年成書。
屠繼善，《恒春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1894 年成書。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1722 年成書。
達西烏拉彎・畢馬，《卑南族神話與傳說》，臺中：晨星出版，2003。
達西烏拉彎・畢馬，《阿美族神話與傳說》，臺中：晨星出版，2003。
達西烏拉彎・畢馬，《撒奇萊雅族神話與傳說及火神祭》，臺中：晨星出版，2019。
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調查、楊南郡譯註，《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臺北：原民會，2011。
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昭和十二年七月一日現在）》，臺北：臺灣時報發行所，1937。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警察本署，《蕃社戶口》，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警察本署， 1918。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二卷）》，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0 年。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番族調查報告書（第一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9 年。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番族調查報告書（第二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9 年。
蔣師轍，《臺游日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1892 年成書。
蔣毓英，《臺灣府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7，1685 年成書。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劉鴻翱，〈綠野齋集選錄〉，收入《臺灣關係文獻集零》，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2，成書年代不詳。

Gray, John Edward. “Notice of a New Finner Whale from Formosa.” *The Annals and Magazine of Natural History: Zoology, Botany, and Geology* 16, no. 93 (1865): 148.

Swinhoe, Robert. “On the Mammals of the Island of Formosa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Zo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1862): 347-65.

Swinhoe, Robert. “Catalogue of the Mammals of China (South of the River Yangtsze) and of the Island of Formosa.” *Proceedings of the Zo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1870): 615-53.

二、專書

中園成生，《日本捕鯨史【概說】》，福岡：古小烏舍，2020 年二版。

林文寶、邱各容，《臺灣兒童文學史》，臺北：萬卷樓，2018。

姜柷山、孫民英、林娜鈴等著，《臺東南王社區發展史》，臺東：臺東縣臺東市南王社區發展協會，2016。

施添福總編纂，《臺東縣史（阿美族篇）》，臺東縣：臺東縣政府，2001。

施添福，《關山鎮志（下冊）》，臺東縣：臺東縣關山鎮公所，2002。

馬克・卡沃達（Mark Carwardine），《鯨與海豚圖鑑》，臺北：貓頭鷹，1997。

翁佳音，《近代初期臺灣的海與事》，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22。

陳政三，《翱翔福爾摩沙：英國外交官郇和晚清臺灣紀行》，臺北：五南出版，2015。

陳國棟，《記憶、海洋與尋常歷史》，新北市：淡江大學出版中心，2020。

陳慧先，《丈量臺灣：日治時代度量衡制度化之歷程》，新北：稻鄉，2014。

曹銘宗，《花飛、花枝、花蠟仔：臺灣海產名小考》，臺北：貓頭鷹，2018。

游珮芸，《日治時期臺灣的兒童文化》，臺北：玉山社，2007。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Beolens, Bo, Michael Watkins, and Michael Grayson. *The Eponym Dictionary of Reptiles*.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1.

三、報告、調查書

海洋委員會編，《國家海洋政策白皮書，2020》，高雄：海洋委員會，2020。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108 年度臺灣周邊鯨豚族群調查計畫成果報告書」，2019 年 12 月 19 日。

四、期刊、學位與專書論文

西村一之，〈臺灣東部的漁撈技術的傳承與「日本」——於近海鏢旗魚盛衰之間〉，《臺灣文獻季刊》55：3，2004 年 9 月，南投，頁 117-144。

沙大禹，〈清代地方志中的鯨魚資源研究〉，山東：中國海洋大學歷史地理學碩士論文，2012。

李宜靜，〈阿美族海祭神話與祭儀之流變〉，《康寧學報》10，2008 年 6 月，臺北，頁 233-260。

李宜靜，〈清代臺灣文獻中的鯨魚傳說〉，《康寧學報》14，2012 年 6 月，臺北，頁 67-80。

李毓中，〈十七世紀跟著西班牙人來到臺灣「菲律賓外勞」〉，《歷史月刊》231，2007 年 5 月，臺北，頁 21-23。

李鑑慧，〈由邊緣邁向中央：淺談動物史學之發展與挑戰〉，《成大歷史學報》58，2020 年 6 月，臺北，頁 253-264。

周育聖，〈臺灣神話傳說與故事中的海洋文化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與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周泳恩，〈臺灣民間故事的「海洋幻想」研究〉。臺中：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所碩士論文，2015。

林朝棨，〈臺灣化石脊椎動物目錄〉，收入陳兼善，《臺灣脊椎動物誌（上）》，臺北：臺灣商務，1993。

范玉廷，〈臺灣原住民族口頭傳說之島嶼試探——兼論 sanasai 的真實與想像問題〉，《有鳳初鳴年刊》13 期，2017 年 5 月，臺北，頁 194-217。

曹永和，〈臺灣史研究的另一個途徑——「臺灣島史」概念〉，收入氏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著《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2000。
陳光祖，〈試論臺灣各時代的哺乳動物群及其相關問題——臺灣地區動物考古學研究的基礎資料之一（下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1：2，2000 年 6 月，臺北，頁 367-457。
陳宗仁，〈1632 年傳教士 Jacinto Esquivel 報告的解析——兼論西班牙佔領前期的臺灣知識與其經營困境〉，《臺灣文獻季刊》61：3，2010 年 9 月，南投，頁 1-34。
陳俊男，〈撒奇萊雅族研究史與評析〉，《政大民族學報》第 26 期，2007 年 12 月，臺北，頁 143-164。
陳國棟，〈上達天聽——乾隆八年苗栗通霄的鯨魚大擱淺事件〉，《臺灣文獻季刊》（別冊）32，2010 年 3 月，南投，頁 2-13。
陳德勤，〈清代臺灣鯨目動物史料初探〉，《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15，2010 年 12 月，臺北，頁 38-45。
許先媜，〈臺東縣關山鎮地方發展的特色〉，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碩士論文，2007。
張隆志，〈從「舊慣」到「氏俗」：日本近代知識生產與殖民地臺灣的文化政治〉，《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 2 期（2006 年 11 月），頁 33-58。
楊鴻嘉，〈臺灣產鯨類之研究〉《臺灣省立博物館科學年刊》19 卷，1976 年 12 月，臺北，頁 131-178。
蔡政修、R. Ewan Fordyce、張鈞翔、林良恭，〈臺灣鯨豚化石研究回顧與現況〉，《臺灣生物多樣性研究》15：2，2013年4月，南投，頁 115-117。
蔡惠琴，〈從鯨魚到飛魚——原住民的魚類神話傳說與飲食文化〉，《中華飲食文化基金會會訊》，13：4，2007 年 11 月，臺北，頁 23-29。
鄧郁生，〈日治時期阿美族女人島傳說的異域論述〉，《臺灣文學研究學報》15 期，2012 年 1 月，臺南，頁 117-150。
魏國彥，〈臺灣第四紀哺乳動物化石研究的回顧與前瞻〉，《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特刊》18，2007年9月，臺北，頁261-286。
蘇品如，〈地質時代第三紀存廢爭議〉，《地質》35：3，2016 年 9 月，新北，頁 75-79。
Aguilar Jr, Filomeno V. “"Filibustero", Rizal, and the Manilamen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hilippine Studies* 59, no. 4 (2011): 429-69.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Fajardo, Kale bantigue. “Manila Men.” in *Asian American Society: An Encyclopedia*, edited by Mary Yu Danico. Sage Publications, 2014.

Huang, Tunyow. “A New Species of a Whale Tympanic Bone from Taiwan, China.” *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Paleontological Society of Japan, New Series* 1966, no. 61 (1966): 183-87.

Jackson, Jennifer A. et al. “Global Diversity and Oceanic Divergence of Humpback Whales (*Megaptera novaeangliae*).”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281, no. 1786 (2014): 1-10.

五、網站及資料庫

國立臺灣大學數位人文研究中心，「度量衡單位換算系統」（2011）：http://thdl.ntu.edu.tw/thdl_tool/weight_measure/。

陳瑩，〈所以說大翅鯨到底有幾種？〉，「鯨群網頁」：https://haideeya.wordpress.com。

陳瑩，〈鬚鯨一家親：全基因體分析揭露鬚鯨混血與種化歷史〉，「鯨群網頁」：https://haideeya.wordpress.com。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The Island as Told by Whales: Cetacean Folklore and Records in Taiwan Before the 19th Century

Yu-hsin Hsu*

Abstract

Surrounded by oceans, Taiwan boasts a diverse and abundant marine environment, especially noted for the rich cetacean ecosystems in its surrounding waters. Cetaceans play a vital role at the top of the marine food chain and serve as key indicators of ecological health. Legends and stories from centuries ago, recounting encounters between humans and sea life, highlight Taiwan's identity as an island and its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ocean.

Before the advent of written records, fossils served as evidence of past life.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zation, numerous cetacean fossils were unearthed in Taiwan, offering insights into the island's marine ecology from millennia ago. Beginning in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local gazetteers and travel notes on Taiwan's immigrant society also recorded the biological features of cetaceans – sometimes portraying these creatures in exaggerated terms as mysterious and enormous sea beings. At the same time, Western naturalists, including Robert Swinhoe, introduced new perspectives by analyzing and identifying stranded cetacean species in Taiwan and sending their skeletons to Britain for classification. These historical records of stranded cetaceans contribute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aiwan's marine biodiversity.

In addition to historical records, legends vividly portray the role of cetaceans. Han Chinese folklore tells tales of Koxinga riding a giant whale or of whales taking human form, associating these mysterious marine creatures with pirates skilled in navigating the seas. Indigenous peoples, particularly the Amis and Pinuyumayan (Puyuma), also recount vibrant cetacean legends, with traces of these creatures embedded in their current maritime rituals.

This study aims to re-examine maritime history from multiple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 M.A.,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perspectives, trace Taiwan's island identity, and reveal the persistent presence of cetaceans within the marine historical narrative.

Keywords: Cetaceans, Fossils, Cetacean Folklore, Maritime Rituals, Maritime History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